

2011年4月 总第12期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www.csadge.edu.cn

时事讨论	1
美国：大学收费的经验	1
美国：宾州各大学的校长忧心预算削减的“连锁效应”	1
英国：学费上涨迫使部分大学面临破产	2
热点关注	2
欧盟将设立工业博士学位	2
澳大利亚公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案并提交讨论	3
国际新闻	4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认证机构遭参议院质询	4
法国：2011 年大学进一步走向自治与公平	4
墨尔本：大学受要挟，政府始作俑者	5
中东：科研水平滞后但发展迅速	6
德国：国防部长因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引咎辞职	6
俄罗斯：政府鼓励学生科技创业	7
挪威：研究政策审核即将完成	8
芬兰&沙特：联合推进两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8
英国：大力拓展奖学金项目保护科研	8
埃及：民众呼吁根本性的教育变革	9
统计与调查	9
非洲：高等教育与发展相结合	9
加拿大：大学面临诸多挑战	10
观点集萃	11
莫纳什大学建立海外分校的四点经验	11
伦敦政经学院接受国外捐赠引发道德争论	11
学者才是大学领导人的最佳人选	12
GPA 变革的必要性	13
工会为何会损害高等教育？	13
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道德败坏	14
研究成果	15
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工作的重视：澳大利亚会计学者的意见	15
教育政策新原则：来自德国的案例	16
新书推荐	16

《高等教育的核心：对复兴的呼唤》	16
《校园危机：一个重整校园的大胆构想》	17
读者意见征集	18

时事讨论

美国：大学收费的经验

无论是英国联邦政府、努力与政府斡旋的高等教育实践者，还是那些在思索如何增加学费和如何保障入学机会公平的其他国家，要从美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直接吸取经验并不简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体制的独特性：美国公立大学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州政府管理，而各州又实行着迥然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就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密西根州政府将其州立大学私有化，裁减了州拨款，并允许大学按照市场规律向州以外的学生收费，几乎不限制这些学生的数量。然而，威斯康辛州政府牢牢控制着州立大学的管理，教师薪资不再有竞争力，人才正在流失，现在排名也下滑了。

不仅各州做法迥异，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明显。在常春藤大学，学生无论是否有需求都能得到资助，其额度让美国之外的大学望尘莫及。但是在英国，据说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脱离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教学资助而私有化。不过，遏制英国大学私有化的原因既不是大学的培养成本与学生及家庭的可支付费用之间的鸿沟，也不是投资捐赠和学生贷款体系之间的脱节；真正的制约因素是，大学担心政府会授意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以及各研究理事会切断对大学的研究资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私立大学都运转良好。位于马萨诸塞州富裕的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就被迫削减了学生资助，开始为经费发愁。

美国关于营利性大学的绩效的讨论也可以为英国带来一些显著的启示。英国政府已经慢慢意识到目前的资助政策花费将远超过预期，因而希望营利性大学能刺激现有大学的竞争，并希望这些大学控制住学费增长。然而，美国的经验将给他们当头棒吓。虽然营利性大学能覆盖很多学生，比如凤凰大学的规模可与纽约州立大学并肩，但营利性大学对促进社会流动以及降低成本的作用仍含混未明。营利性大学还以学生贷款的形式把钱从纳税人的口袋转移进了大学股东的腰包，其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可以支持其偿还贷款的工作并非易事。另外，营利性大学授予学位的价值由雇主认定，这就很可能造成法学院等专业前途光明，但宽口径本科教育的市场反映却不怎么样。

对于英国观察者，美国高等教育可给予的最显著同时也是最令人沮丧的启发在于，高等教育对增加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更平等的高等教育体制。像英国联邦政府这样期待通过迫使大学改变招生政策就能造就更公平的社会不过是白费劲。

（翻译 / 金津 校对 / 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2月27日](#)

美国：宾州各大学的校长忧心预算削减的“连锁效应”

对于宾州州长科贝特（Gov. Corbett）提出的削减大学经费的预算案，宾州各公立大学在2小时的听证会上阐述了他们的忧虑。

宾州州立大学校长格兰厄姆·潘尼尔（Graham Spanier）指出，政府削减了宾州大学52%的拨款，意味着教师失业以及研究和其它活动的资金投入短缺。他说，高等教育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事业，花在

人上的钱占全部经费的 75%，因此资金减少一定会反映在大学人才上。潘尼尔称，100 万美元能转化成 30 份工作，宾州州立大学每年共从外部获取 8 亿美金收入。“我校已经是本地区最大的雇主了，产生连锁反应是一定的”。宾州大学一年的毕业生高达 1.8 万人，为该州的纳税人基数贡献不小。此外，对于宾州州立大学来说，政府拨的经费占到总预算的 8%以及一般教学预算的 17%。潘尼尔说，大学不能把联邦研究经费或用于奖学金的慈善捐赠挪用到一般教学花费上。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校长安·哈特（Ann Weaver Hart）和其他人指出，经费负担本来不应该转嫁到学生上面，哈特说，“而现在整所学校都不得不艰苦度日了”。匹兹堡大学校长马克·诺登伯格（Mark Nordenberg）说，过去 15 年教育和医疗服务部门是唯一每年为该州增加工作机会的部门，2010 年它们也是最大的雇佣部门，“为本地区大幅缓解了大萧条影响的是大学”。

宾州州立大学的理事会主席史蒂芬·夏班（Steven Garban）认为，潘尼尔和其它大学领导人误解了政府的意思。他的话似乎暗示还有调整的余地。他说，“目前 1.8 亿美元的预算削减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想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翻译 / 张蕾 校对 / 李文斐）

[来源：《宾州州立大学日报》，2011 年 3 月 16 日](#)

英国：学费上涨迫使部分大学面临破产

英国政府财政部门警告，在未来的几年内面临破产危险的大学可能越来越多。

英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发现，国家对于及时觉察大学的短期财政问题缺乏有效的手段。NAO 在关于大学财政之间相互制衡的报告中呼吁公众对面临高破产风险的大学加大披露力度。

下议院党际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表示，如果所在学校面临危机，学生具有知情权，“尤其是在学生掌管财务的新时代”。

NAO 认为，学费准收额度的大幅提高（从 3,335 镑/年上升到 9,000 镑/年）、数百万英镑的高等教育拨款削减和公司在学位课程提供方面的侵入都将增加大学破产的风险。

英国大学与学院总工会教师分会的秘书长莎莉·亨特（Sally Hunt）表示，NAO 的报告充分暴露了高学费和低投资的恶果。她说：“尽管这些举措可能使一小部分人受益，但是会造成一大批院校与新政府进行财政方面的艰苦斗争。倘若政府很乐意看到一些大学碰壁，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它们失败的先兆了。”

总工会还将在 3 月 21 日举行为期两天的罢工。

（翻译 / 孙蕾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英国《卫报》，2011 年 3 月 4 日](#)

热点关注

欧盟将设立工业博士学位

欧洲委员日前决定将设立欧洲工业博士学位 (European Industrial Doctorate, EID)。欧盟已宣布, 居里夫人行动计划的“主要培训网络”将提供 2,000 万欧元 (相当于 2770 万美元) 的基金供项目试点, 欧盟还将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整个项目的运行, 并在该委员会和其他 8 个科学委员会之间建立资源共享机制。该项目最先由欧洲议会提出, 可能会产生“杠杆效应”, 获取远高于其运行资金的利益。欧洲议会提出该项目的莫顿·洛可伽 (Morten Løkkegaard) 称, EID 项目能够极大地增强欧洲在创新、发展等关键领域的竞争力。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LERU) 首席政策官员卡特莱恩·梅斯 (Katrien Maes) 也指出, “欧盟聚焦于工业博士是合理的, 工业博士生虽然比例小, 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EID 的基础是丹麦已经实施 40 年的工业研究人才培养方案 (industrial researchers programme), 其中博士生在大学求学的同时也就职于某私营企业。该方案由丹麦科技创新理事会 (DASTI) 于 1971 年发起, 由丹麦科学、技术、创新部执行。至 2009 年, 已经启动了约 1,200 个项目。

根据最近的一份评估报告, 丹麦的工业博士生一半时间在私营企业工作, 一半时间在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这些工业博士生在具有以下优势: 工资比一般博士生高 7%-10%, 并更有可能处于组织的上层; 此外, 参与工业博士生培养方案的企业在专利申请上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但该报告并不能证明工业博士一定能够提升要素生产率。另外一些评估报告也指出, 工业博士培养方案对企业有积极影响, 包括新知识的学习、专利权的增长、新市场开拓以及更多进入学术网络的机会。

(翻译 / 徐贝 校对 / 张蕾)

来源: [《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3月20日](#)

澳大利亚公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案并提交讨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日前发布了一项法律草案, 以设立该国首个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机构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简称 TEQSA。该机构将结合当前由各州实施的各项规程以及由澳大利亚大学质量评估署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 AUQA) 承担的各项活动, 由此将联邦、各州及地区的管理与质量保障机构数量由 9 个减少合并为如今的 1 个。高等教育部长克里斯·埃文斯 (Chris Evans) 参议员在草案讨论时称, 高等教育正经历扩张时期, 建立一套国家监管体系对保证所有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新的高等教育质量机构将作为独立机构被建立, 并拥有监管大学与非大学高等教育提供者、监控质量与设立标准的权力。其首要任务将是确保学生能够在任何高等教育机构中接受由所有已登记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高质量教育, 执行有关标准与绩效的考评, “保证国际教育的质量”, 并简化目前的管理部署。埃文斯称这项草案的发布将伴随着公开的辩论与探讨, 政府会在 3 月 21 日那一周向议会提交这一法案。

由于机构设立初步计划的保密性, 引发了各州及大学校长的质疑与惊慌。一些校长担心大学自治权受威胁并且政府控制力度加大。随后, 所有可能受影响的方面都组织展开了讨论, 包括州政府、大学校长、私立教育提供者、学生及职业教育负责人。法案声明, TEQSA 的监管方法将是“适当并基于风险的”, 综合考虑教育提供者的“学术、教学与科研历史; 学生体验; 财务状况与能力; 及遵守法案

的历史”。该机构将由 5 位理事共同管理。

大学校长协会（vice-chancellors' association）、澳大利亚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 UA）及国家高等教育联盟（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 NTEU）在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对草案的公布表示欢迎。UA 主席彼得·柯德瑞（Peter Coaldrake）教授认为虽然该立法案看似合理可行，但 UA 仍需遵守两个重要事项：“首要的是自我认证（self-accreditation）；其次是有必要处理好其他需要澄清与合理修正的复杂过渡性条款。”NTEU 主席珍妮·雷亚（Jeannie Rea）则称草案已解决了若干由联盟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提出的关于机构作用与责任的问题，联盟因而深受鼓舞。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2 月 27 日](#)

国际新闻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认证机构遭参议院质询

2010 年 8 月，教育认证机构曾因忽略营利性高校过度招生问题而被指控。3 月 10 日的听证会上，这些认证机构再次遇到尴尬。参议院民主党人士就远程教育项目的监督对一家地区性主要认证机构的负责人提出质询，并质疑这些机构是否有能力评估十亿美元级的跨洲教育项目。该听证会是关于营利性大学阿什福德大学（Ashford University）的“个案研究”。

2005 年，布里奇波音特教育公司（Bridgepoint Education Inc.）收购了不景气的宗教学校——大草原方济会大学（Franciscan University of the Prairies），并获得了认证资格，同年创立阿什福德大学，该校开始快速发展。现在该校入学人数已经从 300 人增加到 7.8 万人，其中 99% 的学生为网络授课。爱荷华州民主党人、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负责此次对营利性大学的调查，他对布里奇波音特公司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指责该公司从纳税人中获利却没有真正为学生服务。

出席该听证会的证人为阿什福德大学的监督者，包括联邦政府、爱荷华州、认证机构等各方的代表。布里奇波音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S. Clark）2009 年已缴纳 2050 万美元的罚款，此次拒绝出席听证会。在其新闻发布会上，该公司表示由于教育部正在考虑如何回应阿什福德大学最近的审计问题而暂时无法发表意见。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张蕾）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3 月 10 日](#)

法国：2011 年大学进一步走向自治与公平

2011 年的法国高等教育，以大学校长会议的全新领导团队及新自治大学的第三次浪潮拉开帷幕。同时精英大学校（grandes écoles）也正采取全新规则，旨在为弱势背景的年轻人创造更多入学机会。

2010 年 12 月，大学校长联合会议（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选出了新领导者。巴黎第二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2, Panthéon-Assas）校长路易斯·沃格尔（Louis Vogel）成为新任主席。在 1 月 1 日新领导接管职务后，第三批 22 所大学被加入原有 73 所根据 2007 大学自由与责任法案（2007

Universities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ies law, 或称 LRU) 已获得更多自由处理其自身事务的大学之中。尽管该群体已代表 90% 的法国大学, 但在改革之下, 其余大学也将于 2012 年 8 月全部转变至自治状态。LRU 将诸如预算与人力资源等管理的控制权由国家传至大学, 从而使大学可通过与企业组建基金会以获得更多资金, 并鼓励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建立集群。改革的另一个阶段就是财产所有权自国家向大学转移。沃格尔还表示: “国家绝对有必要继续甚至增加财政投入, 否则我们将无法维持自治。”

另外, 一年前法国高等教育“其他”体系代表——精英与专业导向的大学城曾陷入与高等教育部长瓦莱里·佩克莱斯 (Valérie Pécresse) 的激烈谈判, 她希望将大学与大学校体系更紧密联系。佩克莱斯曾通过法国大学校联盟 (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 CGE) 要求学校放宽其入学条件以接纳那些弱势背景学生。尽管这些大学校的精英校风如此, 其学生通过高度竞争的考试获得就读机会, 但他们大都拥有有利社会背景的父母。每 10 名高等教育学生中有约一名精英大学校学生, 但国家对每名精英学生的花费却比一名普通大学生高出 50%。总统尼古拉·萨科奇 (Nicolas Sarkozy) 对这样扭曲的入学招生也表示不认同。因此让学校放宽其社会混合并招收更多弱势社会背景学生成为政府政策。2010 年 12 月, CGE 主席皮埃尔·塔皮埃 (Pierre Tapie) 发布白皮书, 陈述大学校在过去三年的发展和对未来的建议, 并放宽了对那些具有较显著社会多样性学生的入学。作为回应, 佩克莱斯已要求 CGE 到 2 月就提供出每所学校放宽入学的“具体”建议。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 [《大学世界新闻》, 2011 年 1 月 9 日](#)

墨尔本: 大学受要挟, 政府始作俑者

贝利厄政府一直试图以撤回几百万的研究资金来要挟墨尔本大学对富有争议的阿尔卑斯放牧试验进行监管。政府的这一动作已经受到了大学高级人员的严正指责。鉴于学院与政府签订的每年获益数百万美元的协议, 政府警告土地与环境学院, 希望学院能重新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一月下旬,《周日时代报》(The Sunday Age) 刊登了一系列大学写给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的邮件。这些邮件谈到了大学对于放牧试验所关心的问题, 他们认为试验可测量在阿尔卑斯国家公园母牛是否能减少火灾的风险。在邮件中, 学院执行官戈尔·波辛格教授 (Gerd Bossinger) 提到, 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山区火灾发生的频率没有因为牛群放牧而降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的执行官皮特·阿波罗福特 (Peter Appleford) 回应说, 墨尔本大学并不是决策者。负责森林和公园的执行官阿波罗福特先生补充说: “如果墨尔本大学不能与我方意见达成一致并拒绝实施这个协议,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门将与备用供应商另觅合作……那么这将影响到未来的投资决策。” 昨晚波辛格博士向《周日时代报》证实, 他已经收到阿波罗福特先生的邮件并与他就此进行了沟通: “我们把问题整理出来, 讨论各自的意见并暂时将其搁置一边。现在我们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威胁。” 波辛格博士也在邮件中透露资金安排并没有改变。

墨尔本大学教授马克·伯格曼 (Mark Burgman) 表示, 政府攻击了这所大学的学术自由; 生态学者迈

克尔·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也表示这些邮件实际上是“隐含的威胁”；伦理学家莱斯利·坎龙（Leslie Cannold）提到：“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学机构就这样被要挟了”，并称政府用财权作为威胁是不对的。

（翻译 / 李丹萍 校对 / 李文斐）

来源：[《墨尔本时代报》，2011年3月6日](#)

中东：科研水平滞后但发展迅速

日前科学出版社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了一份名为《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研究版图》（Exploring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Arabian, Persian and Research）的报告。其对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已发表论文的调查表明，这些国家的科研成果占世界总科研产出的比例在过去十年中有显著提升：中东 14 国（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在内）的科研产出占全世界科研产出的比重从十年前的 2% 上升到如今的 4%。汤姆森·路透的分析师戴维·彭德尔伯里（David Pendlebury）说，虽然中东各国的科研水平不均衡，但整体上活力十足且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

报告发现，拥有悠久科研传统的国家往往拥有良好的科研能力。比如，从 14 个国家研究文章的发表量看：土耳其占到 50%，伊朗占 25%；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和沙特阿拉伯是主力军；以上 4 国加上约旦，其科研成果占总研究论文数的 90% 以上。文章被引次数方面，虽然 14 国的整体水平很低，科研水平较高的国家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其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个别领域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数学、土耳其的工程学都有排名前 1% 的高被引文章。

其次，中东地区既有诸如伊朗和埃及这样虽贫穷但拥有深厚的科研传统和文化积累的国家，也有财力雄厚却缺乏科研基础的海湾国家。英国皇家学会科技政策部主任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认为，虽然这些海湾国家的科研水平短期内还无法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但是过去五年中它们对大学进行了巨大投入，16-20 年后该地区很可能成为重要的科研基地。不过，彭德尔伯里则认为，由于一些中东国家局势不稳定，现在下这一结论为时过早。

最后，就如何解决中东地区科研水平依旧比较低这一问题，加州理工学院的艾哈迈德·泽维尔（Ahmed Zewail）教授认为，中东国家首先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和发达国家竞争，其次要激发年轻人的求知欲，同时要防范年轻人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狂热主义和暴力倾向上去；威尔斯顿则认为，“一方面中东地区面临巨大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其科研工作大多是自上而下开展的，因此必须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翻译 / 查岚 校对 / 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3月6日](#)

德国：国防部长因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引咎辞职

德国国防部长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Karl-Theodor Freiherr zu Guttenberg）因涉嫌博士论文抄袭于近日辞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司法豁免权。目前，他正面临初审法庭诉讼，被指控超过 100 项的剽窃。该事件引起了德国媒体关注；同时，“古滕抄袭维基”（GuttenPlag Wikia）网站成为焦点，每日的

访问量高达 180 万。

联邦议院议长诺伯特·拉默特（Norbert Lamers）称该事件是“我们民主制度公信力的棺材钉”。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安妮特·沙范（Annette Schavan）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然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却保留对古藤贝格的支持，她认为古藤贝格是被聘为国防部长而非学者。60,792 位学者联名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对默克尔博士的不满情绪。该信件指责默克尔“嘲笑”了所有学术人士。他们说道：“我们感到你正在袒护一个否认自己博士论文具有欺骗行为的部长，但大量事实却摆在眼前”。信的作者还认为把古藤贝格事件当成一件小事处理将损害德国学术界的声誉以及“创意之国”（Land of Ideas，用于推进与国际企业合作的口号）的公信力。

古藤贝格最终于 3 月 1 日辞职，大概是因为其博士生导师彼得·海伯勒（Peter Häberle）立场的改变。海伯勒重新考虑了他关于古藤贝格事件的首次公众辩解，并在一份声明书中写到：对于他所指导的论文“使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y of Bayreuth）在公众申讨中蒙羞”一事，他“深表后悔”。海伯勒称“古藤贝格论文中的错误是非常严重、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声明：他最初的言论是“自发的、草率的回应”，取消古藤贝格博士资格是必然的。对拜罗伊特大学而言，它在古藤贝格事件中充当了故意欺骗的角色，因而它的学术标准委员会将要进行检讨。

（翻译 / 王玉 校对 / 徐贝）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3月8日](#)

俄罗斯：政府鼓励学生科技创业

俄罗斯希望把大学教授和学生变成明日的比尔·盖茨。作为国家重建科研能力和促进科技创新的一部分，俄政府正鼓励大学开办小型科技公司，从而架起学术与商业间的桥梁，帮助学生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

2009 年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大学开办由私人投资者或政府资助的科技公司。通过签署该法律，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希望在法律上支持大学从创新的科技思想中获利。过去，俄罗斯的大学也会与公司合作，例如把实验室租借给公司，但这种合作关系严格来讲是非法的，尽管当局对此经常不过问。

该法律是为了帮助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俄罗斯一月份失业率上升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俄领导人热切希望更好地连接大学与产业，带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俄政府花费 2 亿美元创建了俄罗斯的“硅谷”。一些俄罗斯研究型大学于 9 月份开始与四所美国院校（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普渡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华盛顿大学）合作，学习其技术转让。为鼓励俄大学开办小型企业，目前已创立了超过 330 家相关企业。

依据该法律，俄罗斯很多大学积极开办科技公司，车里亚宾斯克国立大学（Chelyabinsk State University）就是很好的例子。与车里亚宾斯克国立医学院合办的“医疗技术公司”最为成功，此外还有一家叫“信息分析系统”的新公司。尽管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一些大学管理者抱怨俄罗斯的官僚主义损害了他们的努力。对此，俄政府官员称他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计划与区域相关部门合作来帮

助大学。但是，也许更大的挑战在于让学生参与进来，让他们知道可以自主帮助大学业务的创办。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徐贝)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年3月15日](#)

挪威：研究政策审核即将完成

为应对可能启动的变革，挪威正在审核他们的研究系统。相关结论由奥斯陆大学的教授简·法格伯格（Jan Fagerberg）领导的委员会撰写成文，它们部分是基于来自加拿大、丹麦、芬兰、荷兰、新西兰、瑞士、英国和挪威的比较数据而得出的。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托拉·奥斯兰（Tora Aasland）在去年任命委员会时谈到，“挪威是世界上人均花费研究公共经费最多的国家之一，将近 GDP 的 1%。我们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研究领域投资的物力财力与我们所获得的成果之间的关系，考察这些成果是否质量过关、是否能应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变革。”

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会议，举办教育访学和听证会活动，并委任了一些研究任务。其中一项研究任务比较了 7 个国家的研究系统，并把重心置于公共资助的研究系统。该研究比较了基于七个标准之上的各国情况，采集了相关实证数据，并总结出了最能提供经济价值的要素。委员会相关建议将于 2011 年 5 月 1 日呈交给教育部长托拉·奥斯兰（Tora Aasland）。

(翻译 / 李文斐 校对 / 徐贝)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3月20日](#)

芬兰&沙特：联合推进两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和芬兰签订了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有望极大推进双方教育领域的院校合作。

芬兰高等教育一向以高品质在全球范围享有盛誉，而该协议为沙特学生前往芬兰高校深造提供了机会。一份来自大使馆的声明表明了芬兰对于此次教育领域崭新正式合作的期待，“长期以来，高标准的教育服务体系、国际认可的资质、世界范围内享有美誉的培训和科研系统是芬兰高品质教育的保证。”芬兰完全有能力满足沙特王国活跃的经济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声明称，引导学生进入芬兰的大学和合作研究项目将极大的满足沙特阿拉伯对于教育的需求。它也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之前提出的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到芬兰攻读研究生和本科学位、拓宽芬兰在研究领域与外界合作关系的战略不谋而合。

(翻译 / 严媛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阿拉伯新闻网》，2011年3月3日](#)

英国：大力拓展奖学金项目保护科研

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系拟提供 8 个博士后研究员奖学金名额，用来缓解新进研究人员繁重的授课压力，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时期。

人文学科系科研秘书安德鲁·费尔韦泽-托（Andrew Fairweather-Tall）称，向美国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申请为这一奖学金提供资助的举动，反映出学校已经意识到许多非常优秀的研究者在博士研究生涯后期常常被迫从事教学任务繁重的工作，而导致了没有很多时间来从事研究这一事

实。而高校在招聘过程中更加看重申请人的研究能力，这无疑削弱了博士毕业生对于高校岗位的竞争力。

费尔韦泽-托表示，在沉重的教课负担之余，需要给博士后研究员们创新思维的机会，“我们设置了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系历史上最大数量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名额，因为我们坚信，拥有最优秀的科研带头人是维护大学学术健康的基础，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还是为了保持英国文化和经济的活力。”他补充道，希望大学明年能够继续推出类似数目的奖学金名额。

（翻译 / 严媛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2011年3月3日](#)

埃及：民众呼吁根本性的教育变革

随着埃及在今年初发生的政治动荡，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于2月11日宣布下台并结束其30年执政生涯。而同时，埃及的学术界和研究人员也随即呼吁高等教育政策和工作条件要进行根本变革。

上周末，高等教育委员会向埃及大学最高委员会提出推进大学民主化的倡议。在高等教育部长带领下，委员会起草了涉及大学及研究活动的政策，用于协调公立大学事务。高等教育各组人士呼吁大学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对大学校长及学院院长的遴选。一些教授认为，民主选举大学领导是最透明的任命方式。反对意见则认为，对于大学校长、院长和系领导的选拔，竞争模式优于民主选拔。部分高等教育小组成员还表达了对于高等教育部长哈尼·希拉勒（Hani Helal）工作的不满，其中一项便是指责他未能履行提高基础薪资的承诺，甚至是对于政府在2008年大学教职员工发动暴动后做出的适时适量提高工资的允诺也未能兑现。一直以来，教职员工都抱怨政府对公立大学的低资助与低工资不利于埃及良好学术氛围的建设。

一项反映埃及高等教育表现不佳的事实便是，虽然拥有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该国的院校并未在国际排名中位于前列。根据世界银行OECD组织2010年的调查显示，埃及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未很好地服务于国家，除非进行深远的变革，不然将会阻碍埃及经济和社会进步。OECD世界银行报告建议关注结构变革，特别注重院校管理的灵活性和效率，增加高等教育体系的包容力，为更广大范围的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教育。

面对质疑，希拉勒在2月14日快速做出回应，在他的资金和行政权力范围内答应来自国家研究中心的所有请求，并承诺还将对部长理事会和军方领导人适时给出建议。

（翻译 / 严媛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2月20日](#)

统计与调查

非洲：高等教育与发展相结合

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提倡网络（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dvocacy Network in Africa, HERANA）

对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学的数据进行了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收集。这项历时 3 年覆盖 8 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台一项能够确保高等教育在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协定迫在眉睫，从而能够加强大学中的“学术核心”以及更好地协调高等教育中的各参与方。

该研究包括对文献和公文的综述以及在 11 个国家中进行的大量访谈和数据收集。它聚焦于经济和民主发展这项对非洲而言意义重大的内容，探索了本洲高等教育和地区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份于 2 月下旬出版的综合报告也重点提到了 HERANA 多项研究和报告中的核心发现。该报告指出，当今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在为发展提供所需知识方面的关键作用：“据研究显示，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高端的教育无论对新技术的设计和和生产、对国家的创新能力、还是对民间团体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此外，该报告还呼吁非洲各国效仿欧洲，敦促非洲研究委员会的建立，从而“能够以质量而不是地区或国家利益为基础促进全洲科研资金的投入”。

(翻译 / 孙蕾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2 月 27 日](#)

加拿大：大学面临诸多挑战

今年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与拨款委员会发生争辩，原因就在于委员会减少了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但对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资助却提高了份额。在学生债务已达人均 26,000 加元（约合 26,130 美元）并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大学将奋力争取一个更灵活的研究环境，以帮助大学研究者与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和中国发展双边协定。

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常务董事吉姆·特克（Jim Turk）表示，协会将继续倡导大学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特克称，过去 15 年真正的政府经费已逐渐削减，而丧失的经费则由学费补足。作为学院公司化的长期批判者，特克指出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Canada's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令人担忧的转变：其一年的预算只刚刚超过 10 亿美元。委员会的一项基础研究资助项目——探索拨款计划（Discovery Grant Program），过去三年一直在走下坡路。1978 年委员会创立之时，基础研究项目可占预算的三分之二，而现在却只在 33% 左右浮动。在基础研究遭受损失之时，大学的专业知识似乎正走向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特克提到私人与企业部门在资助决策时日益重要的影响力。最极端的例子是加拿大创新基金会（Canadian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在 12 名委员会成员里，只有 1 名教授，5 名是管理人员，6 名则来自企业界。

对加拿大学生联盟（Canadian Federation of Students）国家主席戴夫·莫伦休斯（Dave Molenhuis）而言，2011 年的焦点在于不断加重的学生债务。但是，如果一般学生也因高额学费而背负更多债务，那么，高额学费对加拿大庞大的原住民群体造成的影响更让莫伦休斯和特克感到担忧。虽然原住民群体中能够拿到大学文凭的年轻人数量正在增长，但总数仍然只是非原住民人口的三分之一。莫伦休斯希望政府能够“资助任何有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原住民”。他认为这不仅是道德使命，同时某种程度上也

基于国家财政的考虑,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原住民取得成功, 那么国家在健康和社会保险项目上的负担可能减少。此外, 原住民教育也已被提上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AUCC) 的日程。在其最近的预算提交案中, 协会号召政府以两年为期, 每年将原住民研究生奖学金提高 1000 万美元。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 [《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1月9日](#)

观点集萃

莫纳什大学建立海外分校的四点经验

在第四次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代表大会年度会议 (4th annual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Congress) 上, 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校长伯恩 (Ed Byrne) 教授发表了关于建立海外分校的演讲。他认为, 在其他国家建立一所校园需要大量工作, 高级管理者和学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启动和运行校园并应尝试制定大学的长期战略。另外, 建立海外分校要遵循四个原则: (1) 大学需将其列为战略规划而非临时计划; (2) 不要带着“殖民主义”的想法建立海外分校; (3) 海外分校应与当地院系、政府和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4) 不要把赚钱作为目的, 只需达到收支平衡即可。海外分校的动力或目标应该是把海外校园与学校本部的学术项目结合,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国际经历或者是新的教学与研究机会, 从而加强校本部的建设。

1998年, 莫纳什大学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邀请下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分校, 现在莫纳什大学已经拥有4个海外分校。伯恩称, 莫纳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现在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好的大学之一。莫纳什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分校只有10年历史, 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但已经是一所出色的本科教学型大学。目前该分校的经济状况还处在边缘, 但很快将有所收益, 并且明年将会继续进行投入。最小的莫纳什大学分校是意大利普拉托分校。最后一个是新近建立在印度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莫纳什研究院 (Monash IITB Academy) ——这是一所只招收博士生的研究机构, 并且是澳大利亚与印度的第一所联合院校。伯恩透露, 该研究院可能在今年末或明年初完成基本建设, 学生将被安置在印度理工学院的大系统下。伯恩说: “这样的项目是赚不到钱的。但它会给大量优秀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并且它所产生的变化是激发我们教师活力的另一种途径。”

(翻译 / 王玉 校对 / 张蕾)

来源: [《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3月13日](#)

伦敦政经学院接受国外捐赠引发道德争论

3月初, 伦敦政经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校长霍华德·戴维斯 (Howard Davies) 因LSE接受利比亚捐助而辞职一事, 暴露出一大问题: 在大学接受国外政府的资助方面, 缺乏足够的指导方针。但是, 英国大学部长戴维·威利茨 (David Willets) 称在大学接受国外捐助这一问题上政府不会为大学提供指导方针。在他看来, 大学是“合法的慈善机构”并应遵循慈善委员会对捐赠的相关指导。

他指出：“如果政府对捐赠事宜妄加评判并与世界各国扯上关系，有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然而，英国文化协会行政长官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认为：虽然不应该由教育机构来决定哪些政府的管理方式是合法的，但大学及学者应该比以往更清楚这些事。

在伦敦政经学院争议事件之后，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开始对捐赠进行调查。据发现，伦敦政经学院曾接受了由利比亚总统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儿子赛义夫（Saif al-Islam）管理的一家慈善机构约 150 万英镑（相当于 240 万美元）的捐助。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在退休后接受电台访问时称他在捐赠方面获得的建议“颇少”。而来自伦敦社会融合中心的罗宾·西姆科克斯（Robin Simcox）表示，“大学缺乏相关体系来保障大学的运作免受捐赠的影响”。他提到，英国很多最好的大学都接受来自伊朗、沙特·阿拉伯、中国的捐赠并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

英国很多大学匿名接受大额奖金捐助而无需公布相关协议。布里斯托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副校长埃里克·托马斯（Eric Thomas）称他们有相关的伦理委员会。剑桥大学也表示他们有伦理方面的指导方针。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校长也表明 LSE 事件给他们好好的上了一课。香港大学副校长徐立之（Lap-Chee Tsui）就指出“必须对捐赠方非常谨慎”。同时，徐立之教授称在接受捐赠前有必要报道相关事宜，“LSE 事件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了，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

（翻译 / 徐贝 校对/李文斐）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3月13日](#)

学者才是大学领导人的最佳人选

优秀的大学领导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有人认为首要条件是高超的管理才能，辅以一点过得去的专业能力。与这种观念相反，阿曼达·古多尔（Amanda Goodall）提出，既然专业知识是大学核心事业的要素，那么在选拔其领导人时应将专业知识也列为最重要的指标。不过，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前者的呼声还是倾向于超过后者。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大学被繁冗的管理程序所包围，学者承受着外部问责与维持绩效监控和质量审查的重重压力。管理程序的增长与大学管理人员的增加不无关系：高等教育统计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数据显示，2003/04 学年到 2008/09 学年，英国的大学管理人员从 10,740 人增长到 14,250 人，增幅达 33%；学术人员数量从 106,900 人增长到 116,495 人，增幅略高于 10%；学生数则只增长了 9%，从 22 万人增长到 24 万人。然而，正如一家法律公司不可能聘请非律师（或不成功的律师）来担任其主管，权力总是掌握在律师等专家群体手中。我们应该期待，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财政主管甚至学校的厨师都应是各自领域的能手。因此，作为大学专业人士的学者必须将权力转交给行政管理人员或经理，这确实令人吃惊。

大学的领导者必须是学者，因为通过学术职业获得的知识将为学者将来担任领导职务提供正确决策必需的智慧。大学的核心事务是研究与教学。阿曼达的研究表明，在像大学这样的专业组织中，专家才是领导者的最佳人选，而不是经理人。如果大学校长或教务长由杰出学者担任，大学绩效将获得改善。例如，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科研排名从 2001 年的 48 位上升至 2008 年

的13位。这期间该校正由艾德里安·史密斯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主政。研究还表明,大学的全球排名位次越高,其校长的研究成果被引用的次数越多。换句话说,越优秀的大学越倾向于聘用好的学者为领导人。而相比欧洲和其他国家,美国就聘用了更多一流的学者担任大学领导。什么样的人担任大学领导不仅会影响大学现在的绩效,而且大学校长的被引次数越高,该大学在未来的研究评估中的表现可能越好。这是因为,学者型的大学领导人能更好地理解大学核心事务,更有可能创造出促进其他学者发展的适宜环境。类似地,职业经理人将创造出更适合其他经理人发展的必要条件。两种环境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学行政被繁琐的管理程序围绕,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生产力产生消极影响。最终会造成人才的流失,那些最好的学生也会继续远离学术界。

(翻译/金津 校对/张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1月30日](#)

GPA 变革的必要性

平均学分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 GPA)从两方面来说是个历史错误。首先,它的影响遍布全球,对学生评估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其次,它历史悠久,比现代教育理论和定量评估技术诞生早两个世纪。相比18世纪的学者,现在我们了解的教育评估方法多得多,没有理由继续沿用GPA评估体系了。

运用GPA标准时,教授在评分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转换:质量转换为标签、标签转换为等级、等级转换为序数,最后转换成简单的基数。前四步转换不会影响评估的本质,问题就出在最后一步。序数用于基于“主观定性分析”的排名和分级,基数用于基于“客观量化统计”的列举或计算,两者的转换导致质量排名变成了数量计算。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计算GPA时假设了成绩可以互换从而相互补偿;但不同学科的优劣势不同,可能无法补偿。国际场合上使用GPA会更加混乱,因为各国采用不同的GPA体系或借鉴、修订他国的体系来满足本国的需要。一般来说,80分或80分以上可换算成A(或者A+、A-之类的),但A以下的划分方法就大不一样了。例如,70分在美国和加拿大是B,在俄罗斯、印度、中国、日本却是C。统一各国的GPA等级划分还有其它困难,因为各国使用不同的GPA计算方法。如美国GPA最高是4,韩国是4.5,越南是10,而丹麦是13。更有趣的是,德国的GPA计算体系是相反的,GPA值越低表示学生成绩越好。

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需要转换模式。GPA体系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基数和序数,把算数应用到了等级划分中。这违反了在序数层面等级划分的基本原理。由于各国长期以来不断扩展并修订GPA体系,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并最终使得GPA的界定失去意义、计算方法复杂而混乱。把GPA作为全球性指标来衡量学生表现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要综合考虑更多具体的信息,如学生在相关学科已取得的成绩及其未来的潜力。仅仅意识到GPA体系有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勇气和决心去改变它。

(翻译/尉思懿 校对/徐贝)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3月13日](#)

工会为何会损害高等教育?

在威斯康星州政府的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提出的颇具争议的预算条款中,有一项是剥夺

公立大学教职员工的集体协议工资权。对于那些并不时时关注高等教育动向的美国人来说，这一项或许是最令人吃惊的条款了。毕竟，或许人们根本就不清楚大学教师还有集体协议工资的权力，他们甚至以为工会职员比博士生更像是蓝领阶层的工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会在大学中愈发盛行。据国家高等教育及同行业集体协议工资研究中心于2008-2010年期间收集的数据显示，约有44万教师和研究生加入了工会，较5年前增加了17%。

大学与工会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其背后自然有一些原因。不过，工会的存在会导致大学的环境日渐左倾。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逊（KC Johnson）在一篇讲述学术工会风险的文章中所说：“自从学者入职并成为劳动积极分子以来，那些被工会的服务所吸引的教师更容易在即将获得教授职位的节骨眼上栽跟头，而这种职位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片面的。”

一些专家还担忧工会会对职业保护有更高的期许，它们甚至想要改变整个大学职业系统的运作。全国劳资关系理事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前任成员皮特·柯森诺（Peter Kirsanow）认为工会“希望介入课程体系、课堂安排及打分常模等等。”

工会的存在还带来了一些其他弊端。由此看来，学生、家长和纳税者确实应当仔细考虑一下大学工会化对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如水牛城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校长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说的那样：“如果你是一位研究者，那么工会化正与你所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背道而驰。从表面上看来，集体所有这一概念并不合适。”

（翻译 / 孙蕾 校对/戴如月）

[来源：美国《图森公民报》，2011年3月2日](#)

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道德败坏

人们一般认为，大学是年轻人的避风港。不管政治多动荡、经济多萧条，教育投资都是至高无上的。然而，近来教育系统也被揭露出存在与政治和经济部门一样的腐败问题。一度被认为是大学特征的对公正价值观的坚守，正在被个人、家庭、族群和大学各自的利益所取代，比如为了个人利益或物质利益而滥用职权。高等教育腐败的途径包括：非法获取物品或服务；大学功能（招生、评分、毕业、住宿及学术产出）中的欺诈；职业性的行为不当（任人唯亲、性骚扰、评分偏见以及研究抄袭等）；偷税漏税以及非法使用大学资产。

大学充当着良好行为的模范，因此社会将为容忍大学腐败付出高昂的代价。腐败还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大学行政人员招收了不合格学生或给这些学生很高的等级评价，高等教育将沦为高价而劣质的物品。既然诚信建立在没有违规违纪的基础上，那么出自有腐败记录大学的毕业生将失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腐败行为也会降低教育投资的个人与社会经济收益，大学学位的含金量也会让雇主存疑——为了降低招聘风险，雇主只能依赖测试、实习等其他筛选机制。

即使在腐败成为常态的环境里，也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沾染。那些“顽强抵抗者”有的是靠道德信念，有的则是基于务实的评价。不管哪种理由，他们都是维持职业操守的中坚。有很多机制可以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大学的声誉。例如：建立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的行为规范，

在公共网站上发布诚信声明, 开办大学“法庭”以举行不当行为听证会, 以及公开发布腐败事件数目与类型变迁的年度报告。

很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希望加入博洛尼亚进程, 把他们的大学学位与欧洲接轨, 并实现课程学分互换。欧洲质量监督注册局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及其他机制都将反腐败作为欧洲认证标准之一。因此, 这一认证过程可能成为清除高等教育系统腐败问题的一个方式。不过, 要有效的调控政策需要更多关于腐败行为及腐败成本的信息。对学生和教师的定期调查可能会有所帮助。事实上, 对一所大学一年两次的调查就能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这表明, 当曝光和职业尴尬动了真格, 敢于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翻译 / 金津 校对/张蕾)

来源: [《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2月6日](#)

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工作的重视: 澳大利亚会计学者的意见

虽然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学术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在恶化, 工作满意度也在相应的下降, 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学者离开部门的人数比过去多。为了调查这个问题, 作者调查了受聘于澳大利亚大学的 3000 多名商业学者 (business academics)。“商业学者”主要指在澳大利亚大学的商业、贸易、会计、管理、经济学系及其他类似领域工作的学者。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 为了找出在商业学者决定是否成为一个学者 (become an academic) 和是否仍是一个学者 (remain an academic) 时的一系列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以及发现有利于达到理想的工作满意度的条件。据预计, 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推论出学者在学术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学术界的原因。

报告初步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受访者成为学者和其他商业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工作场所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接着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教学和研究, 且自主性和灵活性的重要程度要远远超出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程度, 排在第五位的因素是——他们能够隶属于一个学者团体。这些调查结果突显出了商业学者在从事活动中更重视自主和灵活的方式, 而不是他们做什么学者; 也就是说, 教学和从事研究这两个因素是位于工作场所自主性和灵活性之后的。第五个因素也指出了学术的核心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环境的不断改变, 问责制和控制程度日趋严重造成了结构和体制的变化,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在学科水平重要性上是否有显著差异。在分析中, 作者重点关注了商业学者的最大的次分组也就是会计方面的学者。在所有调查受访者中, 约有 50% 是从事会计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科。

这项研究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区别一个特定学科 (如会计学) 的学者同其他商业学者成为学者的根本原因? 就他们选择将继续做一个学者以及他们对于满意工作的理想要求, 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分析显示, 会计领域的学者和其他商业学者在成为学者时对于自主性以及灵活性的要求、在继续做学者时对于行政和教学环境的要求以及在达到理想的工作满意度时的学术氛围要求的相对重要性上

都是不同的。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学科差异的重要性是大学管理人员在招聘和保留会计学者和商业学者的关键因素。

(翻译 / 李丹萍 校对 / 李文斐)

[来源：Watty, K, Bellamy, S & Morley, C. \(2008\).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valuing the job: the views of accounting academics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30\(2\), 139-151.](#)

教育政策新原则：来自德国的案例

多元化、权力下放、管制松绑、学校自治、多样性和家长权力，这些字眼现今都出现在工业化国家教育政策的新指导原则中。这些新字眼的出现反应出，在这些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中，市场理念极大地影响着教育政策的变化。然而在德国却不尽然，驱使教育政策发生变化的动力不是市场，而是德国教育政策缺乏合法化以及现行政策中的矛盾冲突。

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以综述的视角链接到了魏勒尔（Weiler）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先前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些战略措施，其对合法化和司法化问题的解决来说，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格局的转变，反映了其他(尤其是英语语言)国家将市场意识融入到教育领域这一理念上的进步。德国的情况则说明，教育政策政治体制的缺乏合法化，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才是这个转变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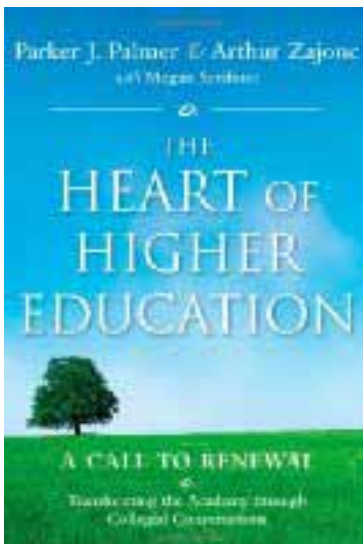
以德国黑森州的新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of Hesse）为例，即便实施了加大父母权力、以及将部分监管和决定权转移至私立学校之类的战略，也无法带来期望的影响，因为这仍不能解决德国学校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性，这些问题在地方教育市场的一些私立学校中也有所体现。

(翻译 / 李毅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Weiss, M. \(1993\). News guiding principles in educational policy: the case of Germany.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8\(4\), 307-320.](#)

新书推荐

《高等教育的核心：对复兴的呼唤》



《高等教育的核心：对复兴的呼唤》提出了一个鼓励人类天赋的教学方法，整合了人的思想、心灵和精神，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代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书中包含详实的理论分析，两位教育家和作家还结合他们过去数十年在整体教育（integrative education）领域的经验，提出了丰富的行动建议。帕尔默（Palmer）对整体学习（holistic learning）的批评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扎荣茨（Zajonc）澄清了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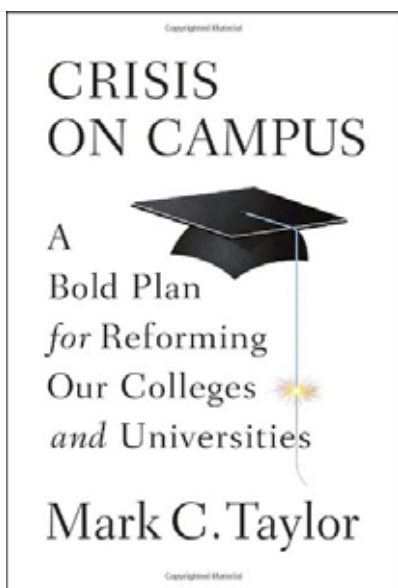
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 并对传统进行了反思。该书探讨了高校激发学生和教职工潜能的途径, 并提出通过协商和对话促进高等教育复兴。无论是整体教育领域的新进入者, 还是想要对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加深认识的人, 或者是那些想在校园中实践并推动这一重要教学方式的人, 这本书都十分有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和海伦 (Helen) 评论说: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以学生和教师的内心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学促进高等院校转型。”阿默斯特学院的校长安东尼·马克思 (Anthony Marx) 认为, 这本书一定会激发我们思考更远大的目标, 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为个人和机构转型而工作的桎梏”。斯坦福大学的安东尼·安东尼奥 (Anthony Lising Antonio) 认为该书为读者提出了“什么应该是教学和学习的中心”这样一个简单又艰巨的问题, 并称“整体教育 (Integrative education) 是现代高等教育产生后最重要的改革”。

(翻译 / 田原 校对 / 张蕾)

来源: Palmer, P. J., Zajonc, A., & Scribner, M. (2010). *The Heart of Higher Education: A Call to Renewal*.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校园危机：一个重整校园的大胆构想》



泰勒充分的阐述了他在 2009 年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有争议的文章, 这篇文章质疑了美国大学从任期制度到学术部门区划的一些传统做法。金融危机导致大学捐赠基金紧缩, 进而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过时做法的担忧。泰勒立足于历史的角度, 阐述了康德的大学的长期愿景及过分专业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学科、任期、和教学上对研究的过分重视。根据威廉姆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验, 泰勒还提供了教师通过远程教育教授多学科课程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例子。高校也可考虑与其他高校、博物馆、智囊团甚至全球特许经营的高校合作。对于同互联网以及 iPods 共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 泰勒热情的就什么值得学习、以

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方法提出了许多更为开放的意见。——瓦妮莎·布什 (Vanessa Bush)

“马克 泰勒作为一位极具独特见解的学者以及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教师, 将美国的高等教育视为一个即将被戳破的泡沫。为了您的学生着想, 为了您的老师着想, 为了您的孩子着想, 为了您的国家着想, 趁着还有时间看看这本书吧。”——杰克·麦尔斯 (Jack Miles)

“这本书令人信服的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并不想知道的事实, 而这肯定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再也撑不下去了——不论是经济上还是运营方式上来说皆如此。马克·泰勒挑衅式的呼吁大的变革, 包括我们如何使用科技来传播教育服务的问题以及教授的角色定位问题。这

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纽约教育部部长。

“公众知识分子的工作之一就是当危险逼近的时候给我们警告。马克·泰勒的《校园危机》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做到了更多。他就‘怎样使高等教育令学生更满意且与 21 世纪这一网络化的世界更相关’这一问题提出了详细的甚至是彻底的建议。”——比尔·布兰德里（Bill Bradley）

“这是一本有必要写且一定要去读的书。马克·泰勒不仅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还为像织工一样工作的我们提供了指导。只有一件事能胜过阅读这本书，那就是写这本书。”——戈登·吉（E. Gordon Gee），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

（翻译 / 蒋航 校对 / 李文斐）

来源：[Taylor, M.C. \(2010\). Crisis on Campus: A Bold Plan for Reform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Knopf.](#)

读者意见征集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如各位有任何建议，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邮件：csge@sjtu.edu.cn

电话：86-021-3420-5941 转 27

联系人：徐贝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编辑：徐贝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编：200240

Email：csges@sjtu.edu.cn